



人文三十年

烏蘭察夫 著

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人文三十年

烏蘭察夫 著

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人文三十年

作 者：乌兰察夫 / 著
责任编辑：木 易
责任技编：郝纪柳
封面设计：吴冠辛
校 对：周修琦

发 行 人：韩方明
出 版 者：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简体中文版）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湾街26-28号富胜工业中心1402室
电 话：00852-2139 2366
传 真：00852-2139 2386
电 邮：hk_shibingshan@163.com
排 版：吴冠辛
印 刷：正光印刷（香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160 mm X 230 mm
开 本：1/16
印 张：30.125
印 数：1000
字 数：375千
版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 978-962-6201-91-6
定 价：HK\$ 86.00 RMB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近影



2000年在北京中国宗教学会年会与任继愈先生合影



1988年8月在内蒙古草原与张岱年先生、石峻先生合影



2000年8月在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1995年11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省区社会科学院院长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高校



1995年11月与女儿甜甜在悉尼歌剧院前合影



1990年11月在呼和浩特市郊区挂职期间与前巧堡村民座谈

回 眸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走进社会科学院的门槛，从此以书为伴，与学术结缘，至今已有三十多个春秋了。

三十年来，在学界努力耕耘，林林总总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重新梳理旧作，百感交集，未曾想到，自己也到了回顾三十年的年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文革，作过知青，随着时代风云的动荡起起伏伏。三十年来，从青年意气到中年哀乐、甲子年淡定；从草原家乡内蒙到南海边陲深圳。世界万象，生命轨迹，心路历程，种种因缘际遇，一一透露在字里行间。

我最初接触理论书籍，是在1968年插队期间，为了消磨时光，总翻阅带来的一些书籍。其中，一本前苏联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一些哲学的命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偶尔和同伴讨论。之后上师专、大学，接触更多人文书籍，兴趣更浓厚了。大学毕业分配到基层市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在内蒙古日报理论版发表最初一篇理论文章。上世纪70年代末调到内蒙古社会科学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从事刚刚新建的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研究，收集资料、编纂目录，曾经远至苏州、上海古籍书店，收集了古籍善本，编写第一份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研究古籍文献目录，未来三十年学术研究行程，也就是这个时期起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是民族整体复苏、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一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评价，整个80年代让人怀念，就如俄国20世纪初

的白银时代一样，是一个国家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那时人们长期压抑后爆发的炽热都有着一种激情、渴望地恶补知识，重视审视以往历史，探究历史的未来。80年代也是我走出家乡，睁眼看世界的年代。

1979年10月，我有幸参加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全国性中国哲学史学会会议，会议以突破日丹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为契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机遇。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荣幸参加由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大师参加的小型座谈会，聆听关于开展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的看法。当年我还是刚出茅庐的年青人，懵懵懂懂，更为遗憾的是记录大师的笔记也找不到了。

进入80年代，思想释放，汹涌澎湃，各种观点激烈冲撞，文化思想开展更为广泛的大讨论。

1983年3月7日，我被邀请参加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会议。我清楚记得，3月7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周扬作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报告，他的报告是女播音替他代读的，她的声音抑扬顿挫，铿锵有致。报告结束末之后，掌声经久不息，大家都被周扬的报告感染了，始料不及的是会议宣布中断，安排游览香山。几天后，会议代表被告知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胡耀邦同志作了大会报告，我在前几排，看到胡耀邦几次身体前倾，显得激奋，不久，李先念先生离开会场。事后才知道，当时沉浸在周扬报告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寒流开始了涌动。这一切对于刚刚步入学界，乳臭未干的年青人，是第一次政治风云的见面洗礼，感到懵懂迷茫，随着时光推移，逐渐明白了其中事理。

80年代初，我的人生发生变动，撞上了“官运”。82年在内蒙古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后，83年7月年仅32岁被任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成为当时内蒙古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

一夜闹得沸沸扬扬，感到从未有过的精神压力。也许从那时起，我更愿意埋头案前，读书写作，反而心境平静了许多。自己也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投稿《光明日报》，想不到，1984年6月11日，这家在全国极有声望的报刊，发表了我的文章《皮亚杰发生论对哲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编者作了按语，我当时揣着这份光明日报，不由看上几眼，激动、兴奋，难以言表。不久，《蒙古族早期宗教与无神论思想萌芽》在《哲学研究》1984年第11期发表，《试说蒙古族天文史所反映的宇宙观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在1988年第2期发表。接踵在各大报刊发表的文章，让我惊喜不已。在那个年代，能够不断在全国性刊物发表文章，可为“凤毛麟角”，何况我的学历、学识更是不可能的。也许是这种情结，我始终摆脱不了固有“书生意气”，也只能最后在官场“意气”地退出。

80年代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白银年代，参与撰写一个又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参加入选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宗教学会的理事，有了更好的机会接触学界的名人大师，亲临了学界前辈的指导和教诲。在这一阶段，在学界前辈的指导下，在撰写项目过程中，得到搜集资料、论文写作、理论分析等多方面的基本功训练，为今后在学术研究上，奠定了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思想背景。

我参与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宗教学家牙含章主持《中国无神论史》。我负责撰写蒙古族无神论章节。课题组经常一起讨论开会。牙老个头不高，总是面带笑容、慈祥，令人敬重。课题组为某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牙老不愠不火用带有浓重甘肃口音，谈自己的看法，对章节修改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遗憾的是牙老1989年逝世，《中国无神论史》1992年出版，对牙老也是一种告慰吧。近期网上拍卖文革期间的《牙含章反党反社会主义资料》是内蒙古大学革委会编印，看到此条，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在学界接触过石峻先生，他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90年代初，我曾到中国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的住宅，摆设简单、朴素，他对于我们到来非常热情，并给予指导和鼓励。我几次想请他老人家为我的论集作序，难以张口，事后又写信。没曾想到，过不长时间，他老人家寄来序言，并给予极高评价。事后，我在几次中国哲学史会议期间，向他老人家表示感谢，但人多，我感激之情只能默默在心里涌动。

在学界，有所接触的还有任继愈先生。我读第一本哲学史书就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在几次中国哲学史会议都见到他老人家。任继愈总是穿一件大衣，西服革履，系着条纹的领带，握着一根拐杖，儒雅矜持。他的弟子描述他有一种贵族气质，他的身上有古人之风，“就像一位英国绅士”。初次和他老人家交谈，是在他老人家在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室，他热情接待我们，并询问我们开展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研究一些情况之后，派人让我们参观国家图书馆古籍部。1988年8月，在内蒙古召开的中国哲学史会议期间，我陪同任继愈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石峻先生游览草原风光，至今保留一副珍贵的照片，背景是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依稀可以看到羊群。三位世纪大师，目光深邃，从容慈祥。之后任继愈先生为我牵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古哲学思想史》题辞。2000年我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古族无神论史》结项后，他老人家文题写了书名，该项目获内蒙古“五一”工程奖。2002年4月在井冈山召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我聆听任继愈先生两次发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要发展，必须从书本到问题，要增强比较研究，要加强民间思想研究、亚文化研究，要加强地域地方同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要有全球意识，要重视审视中国哲学史对象、方法范畴研究”。在讲话结束时再三强调：“年青人要把眼光放大一点，齐白石六十岁才有自己的风格，以前是模仿，我也是六十岁以后开始写作，而且是一只眼”。老人家的教诲，余

味深长，发人深省。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风雨如晦”而又“鸡鸣不已”的经历，生活如同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曲折起伏，在命运的铁砧上，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捶打，让人刻骨铭心。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已“四十而不惑”的年龄，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接踵而来的变故。独自一人携幼女，生活从此走向孤行者，生活的路自己走，生活的坎自己过，工作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一介“书生”到郊区挂职党委副书记。对于我一个曾是插队知青，本来对农村就有着一一种固有的情结，走进乡村仿佛回到插队的年代。我挂职的三年，我走遍了郊区265个村庄，接触的大多是郊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朴朴实实，我们在一起，泥壶饮酒，烩菜炸糕，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尽管远离市区，但平复了心中的伤疼。郊区这块土地，一草一木，让我留恋，也是工作经历心情最舒心一段日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郊区挂职三年不久，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这是我第三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我对中央党校环境较为熟悉。60年代我还是小学生时，随老母亲看望住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老父亲，记得是国庆节，第一次看到天安门上空的礼花，惊喜不已，给我一生留下难忘的印象。第二次80年代，我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来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半年。同年级有将军、官员，我和前国家女排小陈是班内年龄最小的，也就义不容辞排队买电影票，分发学习资料，我经常和组里年长和蔼可亲的老谢在一起聊天、散步，时间几十年了，至今还有通信往来。

我第三次进中央党校，90年代中期，从基层到京城干部培训最高学府学习，又重新全身心投入到知识恶补学习中。党校学习对于我，一是基础理论补课，二是可以看到从未看到的“白皮书”内部资料和境外刊物杂

志。每月从中央到各部位领导都来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有一次朱镕基总理侃侃而谈，整整从早讲到中午一点半结束，同学们并不觉得时间长，在饭桌上继续纷纷讨论报告热点和问题。在党校学习，无论视野还是基础理论补课，为我今后成长奠定重要的学习和研究基础。

90年代中期，我与学界学者牵头合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陆续出版了。由我牵头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蒙古族哲学思想史》也出版了。虽然只有几千元的项目经费，但我们共同辛勤努力，无论是文字风格还是内容创新，受到学界前辈的高度评价，获得国家民委、新闻出版署颁发中国民族图书奖。

90年代下期，我先后主编了《蒙古学十年》、第一部《内蒙古经济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先后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无神论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为今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研究和资料基础。

90年代末期，我主持牵头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族无神论史》获准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由于80年代下半期参与《中国无神论史》基础上，经过大家同力合作，由我主编的《蒙古族无神论》于2001年出版。任继愈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专家们认为“该研究成果，是蒙古学研究领域和中国无神史研究中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实践作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该书获得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文化界、理论界朝气蓬勃的浪潮渐次消退。随着90年代的到来，经济大潮的泛起，整个社会心态发生了大的转型，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物质和物欲方面，理想主义开始衰落。这十年新的中国文化人开始“异化”，他们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身份、职业更加多样，学术文化发生异变、泛化，面对全社会争

相奔走经济大潮，许多人沉默、困惑、无奈、悲观。经济学家茅于軾说“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持有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了谎言。”最后一个儒学大师梁漱溟历经沧桑，晚年无奈感叹“愈来愈看不懂这个世界”。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向文化人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时候，阿拉伯作家能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并且向自己发问：我写了什么？我正在写什么？我的语言是在政治和传统之树上搭巢呢，还是正在开辟新的天地，奠定另一种政治？我是在追逐时代、让大众理解我、为我鼓掌呢，或是试图开创新的写作时代？我是在顺应现实，以便获取实惠与利益呢，还是在撼动现实，以便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量，去变革和建设？我写作是为了占据一把交椅并且安坐其中呢，或是为了继续前行、攀登？”这不值得我们这些文化人反思吗？21世纪是现实的世界，主流趋势造成了一个价值观冲突、风云万变的世界。一个激化冲突、追求浮华的世界，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观方向，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时代。

21世纪初，对于我人生又是一次转折，“意气的转身”离开官场。

21世纪第一个年头，我也近五十岁了。“五十岁而天命”，人到这个年龄段，前途功名大都已成定势，在某种意义上讲“知天命”也就是说“认命”。我在社科院领导岗位也近二十年，历经风风雨雨，相对进入稳定期，但我似乎从来不甘于现状，萌发已久，想换一个环境，终于有了机遇。从塞北到南国边陲深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研究员，辞去在内蒙古社科院的领导职务。这是又一次从生活、工作环境一次跨度很大的角色转换。

最初一两年，人生地不熟，独在他乡为异客，举目无亲，无人诉说，精神的煎熬，郁闷、彷徨渡过最初艰难的岁月。这些艰难日子，唯有

读书、写作给予内心的慰藉，适应新的环境。在深圳特区报全版发表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文化条件”、“道德制度建设探讨”文章。“深圳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发表在“人口与社会”核心刊物上。不久，创办《南方论丛》刊物，编辑“深圳走向世界集萃”丛书。特别是编辑撰写深圳经济、社会、文化蓝皮书，作为深圳改革开放史展览的展品，在社会产生了影响。作为蒙古族的学者，能够参与编辑改革开放前沿深圳市情的蓝皮书，学有所作，做有所为，在深圳感到从来未有的欣慰。由于在学界几十年辛勤耕耘，在深圳短短几年被评为“深圳市享受人民政府津贴专家”。工作荣誉使我对自已更有信心，逐渐适应新的环境。2009年春节，我凭吊宋元海战崖门古战场，仿佛又听到将士冲杀呐喊声，我感慨万千！八百年后。我也步着先辈的足迹来到南海之滨，再创新业。

来深圳十年了，这十年思乡的情感愈来愈浓烈，故土、蓝天、白云、草原、乡情、亲人魂牵梦萦。离开故乡十年了，每年回去，总是被浓浓的乡情氛围所感染。那些难得朴实真心的朋友，相聚一堂，酒酣时，歌声唱起，总是泪盈满眶，激动不已。同事、司机、郊区干部、科研人员，这些普普通通人物，多少年总是惦念着，关心着你，特别是去年深夜，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气喘嘘嘘，拎着沉甸甸的西瓜，亲自登门看望我。事后，我心里久久难以自抑。

这种对故土这种割舍不下的情意，我心中涌起一股冲动，我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继续回报家乡。

我来深圳虽然从事新的领域的研究，但我从未放弃对原来从事蒙古族文化的研究。经常翻阅关于草原民族研究的书籍，关注内蒙古发展的变化。这几年来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开拓研究北方民族历史草原文化新视野。我也很快进入研究的氛围。我这几年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草原文化的文章，每年被选为优秀奖。我还当选草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引起内蒙古